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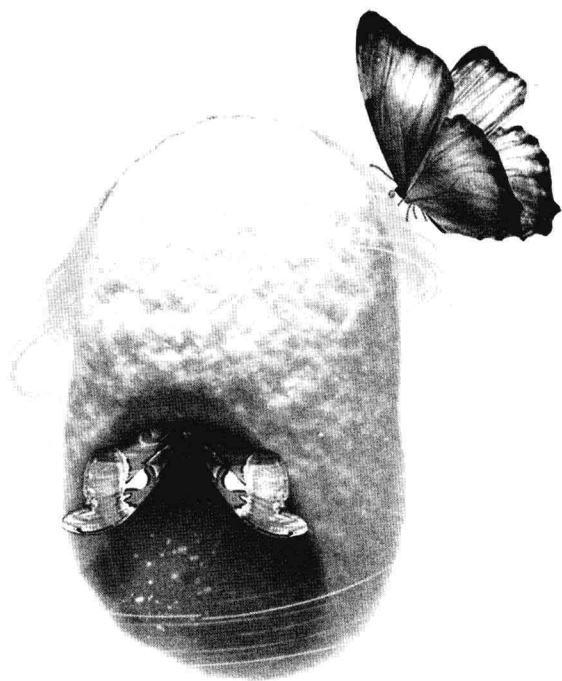


思想的蝴蝶

高校人文讲座十四讲

II

金复生 郭玉闪 / 编



思想的蝴蝶
II

【关于传知行】

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创立于2007年3月，英文名称为The Transition Institute（简称为TI）。我们致力于研究社会转型过程中有关自由与公正的问题与现象，主要涉及税制改革、行业管制改革、公民参与、转型经验研究等等,并通过各种渠道向公众推广。其他出版物可从我们的网站上获取。

邮寄地址：北京市海淀区83-034信箱 / 邮编：100083 / 电话：010-62618102 /
传真：010-62618102 / 联系邮箱：chuanzhixing@gmail.com / 网址：
www.zhuanxing.org /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五道口华清嘉园23号楼401-403

目 录

序一：自省的人生	1
序二：大学精神的没落与复兴	3
钱理群：漫说鲁迅与五四	7
沈志华：苏联解体和斯大林模式的终结	29
李昌平：乡村治权与乡村治理	53
秋 风：共和国与绅士	77
黄 钟：户籍制度与社会控制	97
高全喜：法治中国的现代性之路	121
秦 晖：两种危机的互动——十字路口的全球经济	143
展 江：新世纪的舆论监督	165
杨支柱：目前中国的人口问题——关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反思	193
何 兵：中国司法改革方向之争	213
王建勋：多中心秩序与宪政	237
潘 毅：中国建筑工人拖欠工资的根源	261
许章润：“我们人民”的法权内涵	283
徐友渔：西方与中国学术界的文革研究	307

序一：自省的人生

黄凯平 / 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大学生活往往以享受自由开始，以承担责任告终。这种自由不止是可以逃课，不止是可以选择自己的职业规划，而是一种独立的精神，一套自主的语言和善于质疑的思维；而责任也不只是听好课，做好笔记，不止是找个好工作，自然也不是考个高分或获取一个“三好学生”的荣誉称号。所谓责任，就是能对自己的选择负责，能充满自信地说“我选择，我承担”。享受自由选择快乐，也承担因选择而带来的结果，不管结果是满意的，还是失望的。

然而，要自信地说出“我选择，我承担”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需要反省，而且是痛苦的反省。未经反省的生活不值得过，但反省是一种否定，是一种自我否定，自己从内心最深处以最苛严的眼光审视自己的价值观，对自己深信不疑的价值一一剖析，直面自己的荒诞和可笑，把自己抛入“虚无”的泥潭，这无疑是一种莫大的痛苦，甚至是最大的痛苦。唯有如此，你才可能化茧成蝶，唯有如此，你才可能拥有强大的内心力量，唯有如此，你才可能敢鄙王公，敢傲富豪。

“我选择”，首先要知道“我是谁”。我是谁？什么才是自我？从小到大，我们的父母、老师都会告诉我们一些“道理”，向我们讲述一些故事；在生活中，周围的人，电视、报刊、杂志、互联网也无时无刻不在散播着各种信息，向我渗透，向我灌输。信息无处不在，而我浸泡在各种价值之中，迷失在价值的丛林里，盲从地思考着生活。五光十色的信息与价值观向我渗透，慢慢地，我相信了这些道理，我认同了这些价值。“我”很可能是被这些信息与价值观塑造出来的，我的喜怒哀乐都源于此。但“我”必须知道“我”是谁，我必须对曾经塑造自我的价值观一一反省，弄清楚自己痛苦与快乐的根源。

反省，可以创造一个新的“我”，但即使再深刻的反省，“我”也不可能超然于历史与文化之外，个人主体性的确定，必定是在反省自己与国家、社会和自然的关系之后的。

自1840年以来，中国也经历着一场痛苦的转型与革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至今没有完成。在这场大变局中，170年来，各色旗帜、各种主义、各路思潮风起云涌，此起彼伏，都在中国的舞台上竞相传唱。本书收集的这些演讲录，很多并不能在主流媒体出现，甚至被压制，被边缘化，不为人知，但这些声音集中了中国当前思想界最有活力的知识分子的声音，都是富有智慧的思索，也是有当今思考中国的代表性的声音。我们把这些演讲收录在一起，辛苦编成册，并不是因为这些演讲能为你一劳永逸地回答“我是谁”这个问题，而是它能为你提供一种选择的参考，为你的自省提供一个多维的坐标。自然，这些声音也是需要反思的对象。

现代社会的文盲并不是不识字，而是对各种思潮的生存活剥。盲从的人不可能获得自由，也不可能承担责任，一个自由的国家也不可能由一帮盲从的人建立起来。而这一切，从自省的人生开始。

序二：大学精神的没落与复兴

杨孚瑞 / 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能请来一流的有思想的学者来给同学们启蒙，曾经是我在北大读书时的梦想。那是1997年三月，北大物理系大二学生高巍组建了北大时事社。我那时在力学系读研，已经开始对社会问题感兴趣，但感觉跟本科在西安交大读书时没什么区别。高巍的聪敏、热情尤其是独立思考使我得到很大鼓舞。我立即加入了时事社，因为年长，正好负责和研究生同学打交道。

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关心社会问题并愿参加社会活动的同学往往以理科居多。这在1996年的保钓风波中就有所体现。当年8月，日本右翼分子在钓鱼岛上竖起绘有“太阳旗”和纪念死者字样的木牌，这些活动都得到了日本政府的纵容和支持。开学后这件事正在发酵。在我们班的同学激励下，我也在46楼贴出一张海报，呼吁保卫钓鱼岛并寻求有志于此的同学。后经同在佟园吃饭的技术物理系同学王飞介绍，和吴涛认识，他也想搞点行动。一起商量后，决定我和刘昆仑向日本驻华使馆所在地的朝阳分局提交示威申请，吴涛负责动员同学。申请示威的日期定在9月14日，以便在驳回后继续申请9月18日的反日示威。奇怪的是我们商量的任何细节马上被学校知道，分别被系和学校领导找去做工作。随后校园里开始了自发的集会和声讨。尽管学生热情高涨，但最后还是什么也没做成，申请示威得到的是一张象书签大小标明001号的“不批准通知书”。9月26日香港人士陈毓祥因保钓遇难又群情激奋了一阵，但也就如此而已。相比于后来1999年学生反美示威的浪潮，1996年只是有个小水花。

1996年的经历使我开始觉得校园生活的苦闷，直到1997年加入北大时事社才有感觉。以此为平台，许多独立思想和社会实践热情的同学走在一起。余杰就是那时结识的，那时他的作品还没有出版，被称为“抽屉文学”，但读起来很令我和其他同学感到震撼。北大里的社团也不少，本科生搞的基本是社会实践性的，比如爱心社，研究生的社团以研究性为主，比如“改革研究会”。北大时事社以本科学生为主，但我也拉了很多研究生进来。本科生的社团很少有什么思想性，而研究社的社团往往功利味道又比较重。北大时事社正好给了许多既有独立思考又有行动能力的同学提供了几

乎。

时事社开始逐渐联系一些有思想的老师来搞讲座。但在上个世纪体制内的老师想讲点稍微出格的话都非常困难。有些老师则要求只能给参加社团的同学座谈，人数不能太多。比如汪丁丁是个有名的经济学家，来座谈体制改革，他就明确要求不要超过15人。但所有的讲座最出格的话也不过是拿外国的事来影射中国现实。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一次是张祥平教授谈到波兰的剧变。他说当时拉一头骡子身上写上“反对波共”也能当选。秦晖老师那时没那么多顾忌，搞过两次讲座，当时就已经非常受欢迎。

现在不少学者敢于公开讲话，这除了因为大环境比原来要宽松之外，还因为知识分子的谋生手段要多得多。而十几年前的知识分子大多还不太敢讲话，因此在体制内能发现一个有真知灼见的知识分子是很不容易的。比如，有一次和朋友一起看到一本好书：《旋转的历史——社会运动论》，作者是王海光。通过给出版社写信得知作者是中央党校历史系教授，再往历史系写信终于取得联系。

时事社的活动除了请老师来讲座还搞过每月一次的“时事论坛”，事先确定一个主题，然后贴出海报，欢迎各类感兴趣的人参加。这个活动扩大了时事社的影响，引来许多在北大求学交友生活的校外青年，也就是所谓的“北漂”。

北大现在进校门要查看证件，那时还没有这么排外。在北大的东门外和西门外，都有一些棚户区，里面住着很多来北大游学旁听的青年人。这里有些人也积极参加时事社的活动，甚至许多有思想的同学和老师是通过这些“北漂”认识的。这些人往往有更强烈的自由精神和民主理念。甚至我觉得当大部分北大学生读书只是为找个好工作或为出国谋个人出路的时候，这些北大外围青年才真正代表了北大精神。在我认识的其中很少一部分人中，就有许多杰出者，比如先为民主理念而坐牢后来做生意很成功的刘宪立，比如后来继续求学成为知名学者的萧瀚，比如求学经商两不误的冉东，还有后来成为知名律师的秦兵等等。

由于校内的社团并不活跃，北大时事社开始和各个高校的学生社团建立横向联系。这个工作主要是社长高巍做的。经过一个学期的努力，与七八所高校的学社社团有了联系。到1997年的9月开学后，时事社又吸收了很多新同学，并且在北大召开了一次几个大学共十三个社团的联谊会。其中比较活跃的除了北大时事社，还有地大的青年论坛，北师大读书会，人大的经济与社会研讨社，清华的马克思主义学会等。青年论坛的会长是靳海科，虽然受传统教育的学生气很浓，但对社会对弱势者非常关心，也召集过几个核心社团的同学一起座谈辩论。清华的马克思主义学会因为官僚习气太重，后来脱离了几个大学社团之间的联谊活动。

几个社团各自进行社会实践活动，关注的重点是农村。90年代的农民和捐杂税很重，而且各种罚款也层出不穷。对农民遭遇的共同关注成为把许多学生联结起来的纽带。1997年北大时事社利用暑假到河北赵县搞过一次村民自治调查。地大青年论坛对农民工的情况进行过调查，北师大读书会发动来自农村的同学利用假期搞些本地调查。各个社团的调查结果互相交流，吸引了更多的同学开始关注三农问题。

1997年底，几个社团联合起来准备利用寒假给不回家的同学搞个学术冬令营，

也就是请若干老师集中几天给同学们讲讲课，使感兴趣的同学对文史哲除了教科书知识之外开拓眼界和提高独立思考能力。当时我联系了秦晖、王海光、钱理群、刘军宁、赵德明等老师，其他同学也联系了几位教授，其中地大同学请来了清华搞马列理论的刘书林和另一位知名老左。这个活动因为左右两派的老师都参加了，既给了同学们比较不同观点和立场的机会，同时也对老师和学生安全有好处。因为事后有些老师反映受到了调查，可能是有清华的保守官员教授参加，冬令营的事没有进一步被追究。

1996年，互联网开始在校园应用，第二年各大高校开始有了BBS，学生们逐渐有了自己的言论阵地。但北大的官方BBS开始没多久就停了，北大的学生纷纷到清华的BBS发言。清华的BBS还专门为许多大学建立了专门的发言区。那时候的网络媒体还极不发达，网速极慢，通过国外新闻网站看消息还很不方便。1997年开始出现了以电子邮件群发的网络杂志《大参考》，1998年又出现了类似的《小参考》。这网络杂志因其无所顾忌的言论理所当然的被当成了“反动刊物”，但毕竟有了一个消息源，它带来的许多消息再通过BBS传播到校园网。那时清华BBS很快就发展出敏感词过滤系统，记得有一篇关于陈希同被双规的消息改得几乎面目全非才终于留在了BBS上。北大学生没有自己的BBS的情况直到几年后一塌糊涂的出现才结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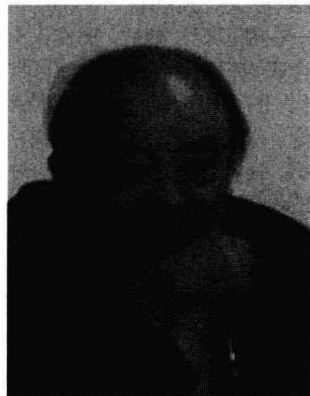
压力逐渐开始了。有人有次周五晚上请李柏光博士讲讲司法独立的意义，第二天的周六上午，他的导师就将其找去训斥一通，质问其为什么不讲讲社会主义宪法。受到压力的当然不只是时事社。微电子系的学生许知远编了一本《微光》文学杂志，刚一出来就受到老师的责问：“坐在半明半暗之间是什么意思？”。在全方位的监控和压制下，北大早已不可能继承“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老北大精神，连校训都改成了俗不可耐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而且北大学生要真的追求这四项其实也是要吃大亏的。

时事社在1997年的下半年开始办社刊《时事》，出了两期后，校团委直接找我和高巍把社团活动暂停。第二年再注册的时候，团委不给注册了，从此时事社就成了北大在90年代一段悲壮的历史。但悲剧并未停止，社长高巍在98年初的期末考试被宣称两门课不及格，也不让查卷，被劝退离开北大。我和几个时事社担任职务的同学在毕业后在考学、求职时遭遇巨大的暗中阻力。实际上不少同学都在档案中有所记录被打入另册。1997年有联系的那几所高校社团有些骨干在毕业后于2000年组建了类似学生社团的新青年学会，但很快就全被拘捕，四人被判处八到十年的重刑。

在北大精神已经没落的同时，官样文章却越做越大。大楼盖的越来越好，学生这个主体却越来越成为被组织的表演者和看客。1998年的北大校庆表现的尤其突出。当晚在静园草坪围起来临时演唱场地，只有很少的北大学生允许进入，而一个社会上跟北青报记者有朋友反而搞到入场券。另一场著名表演是当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北大。先是安排在不大的礼堂中只有安排的少数学生可以进去，而且同学们说提问克林顿的10个问题中有7个是事先安排的。随后在图书馆前举行售书仪式，本来也是只有安排的学生可以参加，但大家冲破了便衣警察的封锁，蜂拥到图书馆前的空地自动坐下。主持人介绍完嘉宾后先介绍党委书记，结果赢来一片嘘声，然后介绍校长才有了鼓掌。那一刻才能使人略微感到了自由的气味。克林顿本来要游校园，但大部分

校园被封锁，学生只能从东门进然后从南边的宿舍区绕着走。同时园区里安排若干人准备着“偶遇”克林顿的表演。结果克林顿取消了游园计划。

上个世纪的最后十年是沉闷的十年，但也有很多有独立思考能力的青年学生开始觉悟，要发出“铁屋中的呐喊”，不过终归在“老大哥”布下的天罗地网中归于沉寂。那时文革后成长起来的一批知识分子已经开始尝试发出自己的声音，但还是很少能穿透体制的铁幕。今天，当北大被当作言论自由象征的三角地被拆除了，但当年知识分子偶尔发出的独立言论现在却汇成了洪流。这是因为人们追求自由平等的天性、追求历史真相的努力从来不会停止。借助互联网这个信息传播的新工具，原来被体制视为洪水猛兽拼命堵截的思想现在却成了常识。青年学生一旦感触了体制外吹进来的新风，就绝不会再甘当接受传统灌输的容器，从此，对真相和对真理的追求被青年学生带入广阔的社会，在不知不觉中给我们僵化的思想言论环境带来了巨大且难以逆转的改变。读一读书中许多知识分子发自内心的话语吧，仅仅十几年前，也许这样的话还能给人带来牢狱之灾。在这个看似不幸的时代，让我们用和平、宽容和理性用心去体会大师们的智慧吧。



钱理群：漫说鲁迅与五四

钱理群，著名人文学者，鲁迅、周作人研究专家。先后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现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与教学。

主持人：

各位同学、各位老师好！今天很高兴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钱理群老师讲新文化运动中的鲁迅。钱先生人好、学问好、讲课好，身体也还好。我受雷永生教授的委托来主持今天钱先生的演讲，非常希望大家能够在钱先生演讲中受到鼓舞和启发。钱先生不用我介绍了。下面我们就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钱先生做演讲。

钱理群：

我今天来讲是有点尴尬的，什么原因呢？因为给我出的题目是要讲“五四”。我是研究现代文学的，好像讲“五四”是我的任务也推托不掉。但我退休之后基本上退出了专业，不做这方面的研究。就只能老话新说，就谈谈这些老观点在当下中国思想文化界有什么样的意义吧。而且讲“五四”，我只敢讲我的老本行，讲鲁迅。我讲的题目是“漫说‘鲁迅五四’”。

我这里实际上是提出了“鲁迅五四”这样一个新概念，因此需要先解释一下。“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一个特点：运动的发动者和参与者只是有一种“态度的统一性”。统一在哪里呢？胡适、周作人有一个概括，就是大家都同意要“重新估定价值”。用我们今天流行的话来说，“五四”那一代人都处在一个社会转型、文化转型的时代，从旧时代、旧文化转变到一个新时代、新文化，就迫切需要对过去大家公认没有问题的价值理念，作出重新估定。比如说，儒家传统强调的“三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君为臣纲，强调儿子对父亲、妻子对丈夫、臣民对君主必须绝对服从，这是长期支配中国社会的伦理价值观，是不容置疑的；现在，五四时期鲁迅的《狂人日记》就提出了：“从来如此，便对吗？”就要提出质疑，重新估定其价值了。这样的对传统观念、价值的重新思考，重新估价，是“五四”那一代的一个基本共同点。除此之外，也还有一些共同价值理想，如我们经常谈到的民主、自由、平等、科学、启蒙等等。但如果进一步去追问，问题就出来了：要重新估定价值，那么，以什么标准重新来估定呢？讲民主、科学、启蒙，但要采取什么样的科学观、民主观、启蒙观呢？具体、深入到这些层面，五四的发动者、参与者彼此的意见就不一致了。这就意味着，在大体上具有某种模糊性的共同价值观念之下，每一个对运动有影响的发动者，或者参与者都以各自不同的追求、实践，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打下自己的烙印，而且形成自己的一个传统，或者我们叫做大传统下面的小传统。于是就有了“陈独秀和李大钊的‘五四’”，最后走向了马克思主义；“胡适的‘五四’”，最后走向自由主义；当然也有“鲁迅的‘五四’”。其实还有别的“五四”，比如说蔡元培的“五四”。我最近在研究沈从文，就发现他在四十年代写了很多关于继承五四传统的文章。他要继承的“五四”传统是蔡元培的“五四”，强调“美育代替宗教”，用文学改造民族灵魂，重建信仰。

这些年围绕“五四”传统有许多争论，大概就是由“五四”既有一个“大传统”，还有许多“小传统”这样一个历史状况而产生的。有的人认为“五四”传统就是走向马克思主义传统，有的人认为“五四”传统就是自由主义传统，等等，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都可以举出许多历史事实来证明，谁都不能否认这些传统的开创者李大钊、陈独秀或者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起到的巨大作用。但这样的认识与概括，却又是可以质疑的。问题在哪里？首先是用小传统代替整个的大传统，这不仅是以偏概全，而且还隐含着一个个争正统的意图，这恐怕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通病：总喜欢把自己现实选择，说成是一个历史上的正统，以今天自己的价值立场来讲他所认同的小传统，

夸大其作用,进而贬低以致抹杀其他传统,而且彼此之间对立起来,这样问题就更大。现在就有很多人把鲁迅传统和胡适传统对立起来,有鲁迅无胡适,有胡适无鲁迅,夸大他们之间的分歧,而完全无视他们之间在追求科学、民主、启蒙这些基本问题上的共同点。对确实存在的分歧,也缺少科学的分析,而完全按照“站队意识”去作非此即彼的判断。今年是“五四”九十周年,报纸上对“五四”传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同学们不妨注意一下,是不是有这样的以小传统代替大传统,各争其正统地位的情况,这是会遮蔽“五四”传统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不利于我们对“五四”传统的全面理解和继承的。

因此,我今天来和诸位讨论“五四”,一开始就必须明确地告诉大家,我讲的是“鲁迅‘五四’传统”,也就是讲鲁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打下个人烙印。这背后有三层意思。第一,首先要肯定,鲁迅“五四”是“五四”大传统下面的小传统,它跟我们一般讲的“五四传统”基本上是一致的,是它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二,“鲁迅‘五四’”跟其他的小传统,比如李大钊、陈独秀的“五四”和胡适的“五四”之间的关系,是有分歧而不对立,而且是互相补充,形成了一个结构的。其三,鲁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是独立和重要,不可或缺的,而且在以后的现代思想文化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吸引了一大批追随者,因此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鲁迅传统”,它源于“五四”,又有新的发展。我今天就是要讨论作为源头的“鲁迅‘五四’”,看看它有什么独特价值,以及今天的启示意义。

但在讲鲁迅的独特贡献之前,我还要先对一个几乎已成定论的观念进行质疑。同学们学习现代文学史,提到“五四”,都会强调“鲁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这似乎已经成为常识,但恰恰是有问题的。首先鲁迅自己就不承认。他说得很清楚:我是奉命而写作的。鲁迅第一个小说集叫《呐喊》,就表明自己不是“发号令”的人,而是“呐喊助威”的人,是“听吆喝”的。“五四”的主将是谁?这里也还有一点需要分辨:“五四”运动其实是一个笼统的说法,它至少是两个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下面又有很多层次,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五四”文学革命,还有“五四”思想革命,伦理革命,等等。“五四”另一个重要组成就是“五四”爱国学生运动,就发生在1919年5月4日那一天。我们这里讨论的,其实只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将,现在按照一般学术界的观点,都认为是陈独秀。而“五四”文学革命,鲁迅说,是胡适发动的,这是符合事实的。有意思的是,陈独秀本人对于鲁迅在“五四”时期的地位和作用,有一个回忆,我觉得非常重要。他是这么说的:鲁迅先生和他的弟弟启明先生(周作人)都是《新青年》作者之一人。虽然不是最重要、最主要的作者,发表的文章也很不少,尤其是启明先生,他们两位都有他们自己独立的思想,不是因为附和《新青年》作者中某一个人而参加的,所以他们的作品在《新青年》中特别有价值。陈独秀的回忆提供了三个很重要的信息:第一,鲁迅和他弟弟周作人都不是主要作者,当然就不是主将;第二,五四的时候,周作人的作品比鲁迅多。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周作人的影响是大于鲁迅的;第三,但鲁迅有自己独立思想和贡献,因此是有特别的价值的。我想陈独秀这样一个评价是比较科学、比较符合实际的。

那么,我们今天的讨论,就从这里开始:陈独秀所强调的鲁迅独立思想,独特价值究竟表现在哪里?

首先是他对“五四”启蒙主义的复杂态度。鲁迅当然是一个启蒙主义作家,他自己说得也很清楚:我是抱着启蒙主义的态度去写小说的。但我要提醒同学们注意问题的另一面。大家可能都读鲁迅的《呐喊·自序》,中学语文课本里选有这篇文章;但是,

你们注意没有，当年钱玄同约他为《新青年》写文章的时候，鲁迅对《新青年》这批启蒙主义者提了两个问题：第一，你们搞启蒙主义，是想打破铁屋子。但是铁屋子能凭着几声呐喊，就打破吗？思想、文字的力量到底有多大，鲁迅是有怀疑的。其二，就算你们搞启蒙，把青年们唤醒了，能给他们指出出路吗？如果不能，鲁迅至少认为自己是不能的，那么，既把青年人的神经搞得很敏锐，又找不到路，这不是增加青年人痛苦吗？也就是说，鲁迅对启蒙的作用、效果，也是有怀疑的。

因此，鲁迅对“五四”爱国学生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价并不高，也就不奇怪了。我注意到了1920年5月4日这一天，“五四”爱国学生运动一周年，鲁迅给他的一个学生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说，这一年多中国所发生的学界的纷扰，大概指“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学生运动所引起的社会的骚动，我看它对中国实际上没有什么影响，只是一时之现象而已。这样一个低调评价，是基于他所清醒地看到的“五四”启蒙主义的局限。后来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他看到很多的当年被自己这些“五四”启蒙主义者唤醒的青年去参加革命，最后都被屠杀了，心里非常痛苦，甚至责备自己：是不是扮演了一个帮凶的角色？这样的自责是很具有震撼力的，可以说是把他对启蒙主义的质疑推到了极致。但大家要注意另一方面。鲁迅接着问自己：以后怎么办呢？他的回答是：以后还是要继续挣扎，“还想从以后淡下去的‘淡淡的血痕中’看见一点东西，誊在纸上”。也就是说，即使看到启蒙的局限，也还要坚持启蒙。理由也很简单：第一，尽管启蒙不能根本解决问题，但中国还是需要启蒙；第二，像自己这样的文人，不写文章，不搞启蒙，又做什么呢？这就是鲁迅对启蒙主义的态度：既坚持又怀疑，坚持中怀疑，怀疑中坚持。这样一个复杂的态度，和其他“五四”启蒙主义者是大不相同的。

不仅对“五四”启蒙主义，鲁迅对“五四”两个主要概念——科学和民主，也是采取非常复杂的态度。在上一个世纪初，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期就谈到了对科学和民主两个基本概念的看法。

先看他的科学观。他首先充分肯定科学的意义。他预言，西方的现代科学传到东方，传到了中国，将引起社会、思想、文化的巨大的变革。他对此有极高的期待。因此，他对科学的理解，从一开始和同时代很多人就大不一样。有研究者注意到，鲁迅对于西方科学新发现有着高度的敏感，居里夫妇发现了镭以后，鲁迅马上就写文章介绍镭的发现。我们大家都知道镭的发现，以及由此引发出来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量子力学等等都显示了西方新的科学思维。它和传统的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古典科学思维是不一样的。当时在全世界也是刚刚兴起，鲁迅从一开始就敏锐地抓住它了，而且预见到这样一种新的思维，将带来思想界大革命。他已经看到了科学新思维 and 传统科学思维之间的差别，并由此形成自己对科学的独特理解。比如传统的科学思维，单一地强调理性主义；鲁迅在谈科学的时候，就在肯定科学理性的作用的同时，又强调科学思维里的非理性因素。而当时中国大部分所谓“新派知识分子”，之所以接受西方的新科学，最主要的动机，是希望通过西方科学技术的引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也就是说，大部分知识分子对科学的理解，都是把它看作是一个富国强兵的工具——顺便说一句：恐怕时至今日，许多人的“科学观”也还是停留在“科学工具论”。但鲁迅从一开始就强调，科学所显示的是“人性之光”。科学的本质是人的解放，人的自我发展、自我证实和思想的解放、完善。他从人的健全发展这样一个角度，从人文主义的立场来看待科学，就把科学和文艺看作是两翼，而不是把科学和文艺对立起来。他呼吁，中国需要波义耳、达尔

文这样的科学家，也需要莎士比亚、贝多芬这样的文学家、艺术家，康德这样的哲学家，

科学、哲学、文学、艺术是并行的。这样的人文主义的科学观，从一开始就摆脱、超越了富国强兵科学观，这在鲁迅那个时代，包括“五四”时代，是极为独特而罕见的。

从这样的人文主义的科学观出发，鲁迅就敏锐地感觉到，对科学技术的推崇，如果发展到极端，变成了科学主义，理性主义发展极端变成理性崇拜，就会带来灾难，可能导致人的精神的丧失。今天来看，鲁迅的这一警告，是相当超前的。

这样，鲁迅在“科学”问题上，也坚持了他既坚守，又质疑的基本态度与立场，他以他的现代科学观高举科学的旗帜，又对科学所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保持高度的警惕。这都是独树一帜的。

再看鲁迅的“民主观”。他也同样地强调，西方民主自由的观念传播到中国来，会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的变化，同时也对民主观念提出了他的质疑。因为民主是强调少数服从多数，民主选举就看多数人选谁，谁就当选。鲁迅在肯定这样的民主，民主选举在突破君主专制上的作用的同时，又产生一个担忧：如果过分地强调了少数服从多数，会不会形成对少数人的压迫？他因此提出警告：不要在摆脱了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寡人专政以后，又落入多数人压迫少数人的多数人专政。

正是出于科学崇拜和民主崇拜的警惕，鲁迅特别强调了“自由”的观念，尤其是个体的、精神的自由。他提出“以保证个体的精神的自由”为核心的“立人”理想，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鲁迅的“现代化的想象”。当时不用这概念，叫做“近世文明”。鲁迅如此提出问题：什么是中国所需要的“近世文明”？他说，中国需要科学的发达，物质的丰富，也需要立宪民主，这都是“近世文明”，也即“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根本的，“根柢在人”，在人的个体的精神自由。如果科学技术发展了，物质丰富了，也有了宪政民主，但个体精神自由受到了压抑，那还是没有实现“近世文明”。他的结论是：“立国”先要“立人”，建设现代民族国家，必须以人的解放，人的个体精神自由为核心与指归。这样的一个现代化想象、理想，也同样是超前的。

顺便说一点，“自由”也是“五四”的基本观念。“五四”思想革命就是反对思想禁锢，主张思想自由，人的自主性，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诉求。你们看陈独秀最早的文章《敬告青年》，一开始就说“人是自主的，而不是奴隶的”，强调人的独立和自主。李大钊也是特别重视政治自由。胡适更是对精神自由一往情深。我们讲“五四”传统，如果只讲“科学”、“民主”，不讲“自由”，也会形成遮蔽。

“五四”时期还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平等”。我们经常讲“五四”最重要的是“人的发现”。具体地说，“五四”有三大发现。第一，妇女的发现。在传统中国妇女是没有地位，没有独立人格的，是“五四”把妇女的独立性凸显出来，今天很多人讲女权主义，在中国最早就要推到“五四”。其二，儿童的发现。在中国传统观念里，儿童是大人的附属品，依附于大人，没有独立性，更没有独立人格。是“五四”强调儿童是人的生命发展的独立阶段，有自己的精神发展的要求，应得到尊重与保护。其三，以农民为主体的下层人民的发现。鲁迅自己有个说法，他过去从小受的家庭教育，以为农民不过是花花草草，生命是轻贱的，后来才懂得农民也是人。“五四”如此强调了妇女、儿童、农民和下层人民独立价值和独立人格，这是因为他们在中国传统社会思想文化结构中都是处于弱势地位的，用今天话说就是弱势群体。我看今天还是如此。“五四”重

新估定价值,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肯定这三大弱势群体在传统中被忽视、抹杀的价值与权利,这背后就隐含着“平等”的观念。

鲁迅无疑是“五四”平等观最坚定的倡导者与实践者,他的“救救孩子”的一声呐喊,他对“祥林嫂”(妇女)们和“闰土”(农民)们的命运的关注和描写,都是开创了中国新思想、新文学的新纪元的。但鲁迅在平等问题上,也同样保持清醒,他提起人们注意,如果把平等的要求极端化,变成“夷隆实陷”的绝对平均主义,也同样会带来灾难。鲁迅对于平等,也同样持既坚守又质疑的态度。

我们可以作一个简单的小结。“五四”价值重估所建立起来的新价值,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五四”大传统,其实就是五个观念十个字:启蒙,科学,民主,自由,平等。鲁迅的特殊性,或者我们说的“鲁迅‘五四’”的特点,就在于他在坚守这五大观念,以和“五四”先驱者保持总体一致的同时,又对之进行质疑,也就是把他的怀疑精神也贯彻到“五四”基本理念上,对可能产生的极端化造成的弊端,保持高度的警惕和清醒。

我们还可以再追问下去:鲁迅为什么会对“五四”基本理念采取这样的“既坚守又质疑”的复杂态度?这不得不说到鲁迅或者五四那一代知识分子,所面对的两个问题。

首先,他们直接面对的是政治和思想上的东方专制主义。因此,需要从西方引入科学、民主、启蒙、平等、自由等新观念,来打破东方专制主义的禁锢,以获得政治、思想上的解放。而这些新观念,它们都是西方工业文明的理念。而鲁迅等中国思想先驱在接受这些西方工业文明的新观念时,在西方本土上,工业文明自身的问题已经暴露,形成了人们所说的“西方文明病”。比如二十世纪初,鲁迅在日本求学时,日本正处在一个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代。科学、民主等极端化的负面影响已经呈现,也就是说日本已经开始尝受西方文明病之苦,从而引发了日本思想、文化、学术界对这些西方工业文明的基本理念的反思。这也就不能不深刻影响正通过日本接受西方工业文明的中国最敏感的知识分子的选择。我们说鲁迅这一代知识分子面对的两个问题,一是直接面对的本土的东方专制主义,另一是在日本社会和西方社会里可以感受到的工业文明病。前者是现实的问题,后者是可以预见的问题,如何选择,就出现了困惑。

于是,我们发现,这一代知识分子大体上有四种选择方式。第一种,承认西方文明可能有它的弊端,但强调在当下的中国最重要的是解决东方专制主义的问题,因此主张先把西方的理念全部引进来,作为破除东方专制主义的利器,以后产生了弊病再来解决。这大体就是“全盘西化”的思路。第二种,看到了西洋文明的毛病,反过来觉得还是中国的传统最好。并进而想用中国传统来拯救西洋文明,以及拯救整个世界,这就是“五四”时期,以至今天的某些“文化保守主义”的思路。因此,大家可以注意到,五四文化保守主义的提倡者,辜鸿铭他们并不是不懂西方文化,甚至可以说是精通西洋文化,深知其弊病的,才会有转而从中国自身传统中寻找出路的想法。第三种,就是选择“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批判资本主义的产物。陈独秀、李大钊等共产党人选择马克思主义,就是试图用西方最具批判性的思想,来同时担负两个任务,既批判东方专制主义,又批判西方资本主义,从而建立起一个理想的新的社会,新的文明。这就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很多人都转向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的原因。

以上三种选择,或全盘西化,或拒绝接受西方文化,或东方文化、西方文化通通批

判，价值取向完全相反，但都旗帜鲜明，态度决断，并都自以为找到了唯一正确的道路，在基本思维方式上其实是相通的。而鲁迅的选择，我称为“第四种选择”。鲁迅从一开始就认定，任何文化选择都是有弊端的，想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问题根本不可能。于是，他不试图找一个能够彻底解决中国问题的文化，而宁愿采取一个很复杂的态度，既有所选择，又同时进行质疑。这样，他的立场就有点模糊，不那么鲜明，不那么干脆，不那么明快，不那么彻底，甚至充满矛盾，而鲁迅正是要正视矛盾，在坚守与质疑的往返中进行永无休止的探索，他的思想也因此得到不断深化。这也同时是一个在希望与绝望之间往返掘进的心理过程，鲁迅有勇气正视和承担这样的探索中的精神痛苦。鲁迅的可贵在于，他并不因此而消沉，他始终采取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用他的话来说，他总要找一条“似乎可走的路”走。也就是说，他并不是一个相对主义者和折中主义者，他不讳言自己的选择是“偏至”的，也就是我们一再强调的，他首先是有所“坚守”的，对“五四”启蒙主义，科学，民主，自由，平等这样的主导方向，他是从来也没有背离过的；他的特殊，也是过人之处，在于他不走极端，对绝对化的思维和行为，保持高度警惕，有极强的“限度”意识，因此也就永远不满足现状，永不停留，永不放弃，他是永远“听见前面的声音”，永远“往前走”的“过客”。

在我看来，鲁迅这样一种“既坚守，又质疑”的“第四种”文化选择，在当下中国，是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的。这也是我今天演讲的主旨所在。

当下中国，跟鲁迅那个时代有历史延续性，也有时代的特殊性。因此，我们首先要讨论的，是当下中国社会的特点到底是什么？我和很多朋友讨论过这个问题。在讨论中，我经常要引述鲁迅的两个观点。

鲁迅说，中国社会是非常特别的社会，它把几十世纪缩在一时。有的地方已经有了电灯，有的地方还点着油松片；有的地方坐飞机，有的地方还是用独轮车；有的地方大讲人道主义，有的地方还在吃人……各世纪的事物都挤在一处，摩肩挨背地存在着。我由此而想到，当代中国正是一个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并存的社会。比如说你到贵州农村，到西部边远地区去看，那里大体上是处在前现代社会；你到中部地区去，湖南、湖北那里已是现代社会；你到北京、上海，就大有后现代社会的味道了：三种不同形态的社会，就像鲁迅说的，都摩肩挨背地同时存在于中国社会。而现实又远比这个概括还更要复杂：在贵州这样的落后地区也有大量的现代的，甚至后现代的东西，北京、上海的某些方面，某些角落，还存在着前现代的东西，这样的犬牙交错，就更复杂了。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状态，我们的立场选择就非常困难。我就经历过这种尴尬，我举个例子。我在北京，用后现代的眼光去看贵州，就觉得随着贵州工业化的发展，少数民族子弟不再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民族文化就会面临逐渐消亡的危险。我为此忧心似焚，就跑到贵州专门跟少数民族的大学生谈话，说你们一定要好好学本民族的语言，不然你们民族文化就要毁灭了。讲完后有个学生递上一张条子，说你谈的文化毁灭对我来说过于遥远，我最关注的是我如何找到工作。学习民族语言找不到工作，学习汉语可以找到工作，学习英语更能找到工作，请钱教授告诉我，如何学好英语？面对这位少数民族学生的提问，我无言以对：我站在后现代的立场，关心工业化可能带来的民族文化危机；而他身处在前现代的社会，对他来说，实现工业化，摆脱贫困是第一的。这样，由所处不同社会面临的问题不同，就出现了认识上的错位。这就是我们今天知识分子的困境：我们身处的社会太复杂，我们面对的问题太复杂，我们的立场与态度也必须复杂。和前现代的、现代、后现代一起对阵，你能用简单、明快、绝对的思维去对待吗？